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NSD

第013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

2023年3月

目 录

本期导读	01
诺奖专题	02
重视早期人力资本 中国将一举多得 詹姆斯·赫克曼	02
对话：教育的基本点与中美关系的难点 詹姆斯·赫克曼、林毅夫	07
中美问题的根源来自美国国内 安格斯·迪顿	11
对话：美国的真正困境与中美关系的挑战 安格斯·迪顿、赵耀辉	14
论坛精选	19
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和改革的要点 余斌	19
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历史方位和关键点 刘伟	23
信心和科学是2023年中国经济的关键 姚洋	26
对“扩内需纲要”的几点认知 夏斌	28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旧法宝与新对策 黄益平	29
走老路稳增长，可能稳不住 刘守英	31
对话：中国经济新征程上的重要挑战与应对 姚洋、夏斌、黄益平、刘守英、王敏 ..	34
学院资讯	40



本期 导读

北大国发院简报

第013期

亲爱的读者：

感谢您的订阅，《北大国发院简报》第13期与您见面了。每一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信息过载、高噪音、碎片化的时代，为您精选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也方便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深度阅读。

2022年12月18日，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我们北大国发院举办了“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本届论坛分为全天的主论坛和五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不同重大议题，集合北大国发院、南南学院、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等北大学者团队，以及中国政商学界知行合一的官员、学者与企业家，以全球视野下的国家发展为核心议题，共同研讨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机遇与挑战，以远见与智慧助力国家发展，推动世界融合。

本期简报精选本届论坛上的部分重要演讲，分为“诺奖专题”与“论坛精选”两大部分。

“诺奖专题”的内容来自在本届论坛上两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和安格斯·迪顿教授的特邀演讲，以及学院林毅夫教授和赵耀辉教授与他们的深度对话。

“论坛精选”包含七篇文章，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斌对未来经济增长空间和改革要点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教授对中国未来五年历史方位和关键点的解读，以及在主论坛的“中国新征程”环节中，姚洋、夏斌、黄益平、刘守英四位教授分别从各自研究角度对中国未来发展挑战与改革措施的观点分享和圆桌对话。

本届国家发展论坛的其他精彩观点文章将于下期简报呈现。

感谢您的阅读，也欢迎您的反馈。在简报最后，我们附有订阅二维码和联系方式。

主编：黄卓
执行主编：王贤青
2023年3月15日



诺奖 专题

北大国发院简报

第013期

重视早期人力资本 中国将一举多得¹

詹姆斯·赫克曼 (James J. Heckman)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我想讲讲如何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来促进中国社会的流动性。

中国目前面临不少挑战，其中很突出的一点是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养老负担越发沉重，年龄金字塔已经倒置。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可以着重培养一批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人口。随着中国年轻人口的更加短缺，多培养一些技能人才既可以补充劳动力，又能使全体劳动力的技能上升。一支更加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除了能补充中国在未来数年内数量逐渐减少的劳动人口，还能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同时，中国的发展还伴随着很多问题，比如地区发展不平衡。当我们谈到“技能”这一概念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不平衡现象就是农村地区的高中毕业率，特别是大学毕业率和入学率过低，与城市地区无法相提并论，且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很大比例。认识到这些巨大的差异非常重要。

中国农村地区存在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人口外流。农村人口向东部迁移，进入工厂，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属于廉价劳动力。这样的

人口流动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但也导致了留守儿童问题。数据显示，全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没有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相关研究表明，这会极大地妨碍儿童走向成功，并影响其技能水平。中国共有约一亿名儿童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人口迁移的影响，这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难题。现存的一些政策，例如户口政策，在不经意间为中国儿童学习技能制造了障碍。

技能培养十分重要，而且宜早不宜迟

现在的难点在于，中国应当如何制订合适的政策，以应对技术型人才短缺的挑战。这就是我主要想讨论的问题——什么样的技能培养政策最为合理？我想谈谈技能习得与培养，并思考全面的技能培养方式应该是什么？基于技能的政策能带来什么好处？

培养技能就是为人们赋能，提升人力资本，使他们有能力解决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流动带来的诸多难题。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对技能有了

1. 本文根据赫克曼教授2022年12月18日在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特邀演讲整理。

更多的了解，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知道，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技能差距很早就出现了，而且技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政策可以通过精心选择的干预措施，缩小技能差距。

来自美国的数据显示，在18岁时，家境富裕的青少年群体，其考试成绩远远高于那些家境不太富裕、父母甚至没有高中文凭的青少年。事实上，这些差距很早就出现了，早在儿童三岁左右，我们就能较为精准地测量出这些差距。我们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关于技能差距的知识，制定出能够消除人力资本差距的最佳政策。

我有两个重要的观察结果，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技能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技能评价维度的多样性应当得到重视。由经合组织（OECD）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从2000年开始实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多个国家都在积极参与，有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则关注智商测试成绩。但是，儿童的人生能否获得成功，评价的维度应该多种多样，我们应当重视评价维度的多样性。PISA和智商测试成绩都只是评价维度之一，绝非唯一维度。

2.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人生的早期阶段在个人技能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技能差距在年龄很小时就有所显现。之所以如此，因为天赋遗传并非唯一的影响，甚至并非主因，社会政策才是主因。

既然知道技能差距很早就出现了，我们要如何利用这一认知呢？难道是车到山前才修路吗？英语有句谚语，只有吱吱响的轮子才能被上油（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grease）。难道我们应该一门心思只关注已知问题吗？其实，对技能差距问题的早期干预十分重要。而且早期干预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前发现并避免问题。

关于早期针对性地提升技能的效果，新西兰最近进行了一项卓越研究，其结果与世界其他一

些类似研究得到的结果相符，即80%的社会问题通常源于人口中的20%。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法则，它不同于经济学领域的帕累托法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帕累托法则。根据研究数据，绝大部分社会问题，如福利救济、吸烟、肥胖、犯罪、处方用药和住院等问题，都与约20%的人群有关。有关这些问题和未来问题的可靠指标，早在儿童五岁时就已经显现。因此，我们可以尽早评估辨别出这部分人，然后在他们人生的早期阶段就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

我们对技能发展有多少了解呢？至少在西方国家，大约50%的终生收入不平等现象，其根源在18岁时就已初见端倪。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技能并不局限于多年的学校教育，也不局限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或智商测试，性格和个性技能（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skills）的重要性应当得到重视。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这个概念很多人熟悉，指的是做出明智决定的能力，把握自己人生并明智地思考前进方向的能力。认知能力很重要，但动机、自控、自尊等其他因素也极其重要。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些因素，尽管最近经合组织开始通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衡量青少年的这些因素。

了解一个人的社会与情感技能，可以有效对这个人未来可能的犯罪行为、收入、健康状况、公民参与度、生育、信任和能动性等方面做出预测。然而，人们常常只关注学习成绩或者考试分数，而忽视社会与情感技能。这些技能都有很强的可塑性，我们可以尽早采取合适的干预措施。

儿童时期是培养人力资本的宝贵窗口期

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培养这些技能？

大多数人将技能培养等同于学校教育，非也。举个例子，我们做过一项研究，找来两组儿童，一组来自贫困家庭，另一组则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知识分子家庭中的儿童每小时听到的词汇量是另



一组贫困家庭儿童的三到四倍。不仅如此，知识分子家庭的氛围也属于“肯定型”，而非贫穷家庭的“禁令型”。最终，两组儿童在年满三岁时所掌握的词汇量开始呈现出巨大差异。其他一些类似的调查，通过了解家长给儿童读书的情况，儿童在家中获得知识的方式等，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家庭环境对于技能的形成影响深远。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农村，家庭育儿环境并不理想，农村地区家长在育儿中的参与度低于城市地区。当思考“儿童贫困”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认识到，这不仅仅事关金钱，更包括家长为鼓励和激发孩子而采取的措施。

关于技能的动态形成过程背后的科学原理，存在两种观点：第一个是静态互补，能力更强的人带来的回报和边际产量更高，学习到的知识也更多。这是事实。许多人会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只应投资能力强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还有第二个观点——动态互补。如果我们现在针对弱势儿童进行投资，日后将获得更高的回报。动态互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从静态互补的角度看，目的明确、积极主动、善于动脑的人群是最佳投资对象。但事实上，这些动力可以被激发，这些技能也可以被培养。这是我们研究得出的新发现。多种研究一致得出的结论是：技能产生技能（skills beget skills）。方方面面的技能，包括社交、情感、健康和认知等会相互作用，并有助于开发新技能，并营造培养更高效技能的新环境。因此，如果审视每单位投资所带来的边际产量，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从儿童的早期阶段开始投资，成效更显著。

这一点很容易被误读。尽管我认为早期投资带来的回报或边际产量很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在早期进行投资。其真正含义是，在儿童成长的早期阶段进行投资，后期带来的回报将是最高。

早期人力资本提升的试验

关于可行的早期干预措施，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些例证。

我参与过一个非常典型的项目，“佩里学前教育研究计划”，它推动了美国著名的“开端计划”及另一项激励计划的实施。“佩里学前教育研究计划”主要通过提升儿童的社交和情感技能来发挥作用，这类技能以前被视为某种人格特质，无法进行人为干预。这一计划从儿童三岁时开始实施，每天进行两小时，一共持续两年。课程内容是孩子们参与活动，自行制订计划，执行计划，最后回顾反思。我们对这些儿童进行了持续的追踪调查后发现，每一美元投资的年度回报率约为10%。这是非常高的回报率。

我们追踪调查的对象并不限于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研究的那些儿童，而且还包括他们的下一代。我们发现，他们下一代的人生也比较成功，这是一种渗透作用和动态乘数效应。因为第一代儿童的家庭生活情况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就得到了改善，而这进一步为他们自己的孩子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第一代有更大的概率会结婚成家，更有可能获得比其他父母更高的收入，而父母犯罪入狱的可能性则更低，如此等等。其他一些研究项目也发现类似的高收益。

另一个研究结果更加震撼人心，那就是这些项目所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益处。例如，约五十年前启动的“初学者计划”，我们追踪调查了一些儿童的一生，发现他们患有高血压、胆固醇、腹型肥胖、代谢综合征之类疾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项目并没有医疗干预措施，而是培养儿童的执行功能，也就是儿童的学习能力、自控能力、照顾好自己的能力，以及避免让自己生病、避免不健康活动和行为的能力等等。如果将健康因素也计算在内，后期的综合年回报率达到14%左右。这确实是巨大的回报。

这背后的机理是什么？项目的重点是丰富儿

童在托儿中心以外的生活，并使父母积极参与育儿，这些就是我们发现的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在“佩里计划”和“初学者计划”中，在行为控制及父母子女互动方面，育儿方式都得到了改善。此外还有社会流动性方面的变化。通常，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存在着紧密关联。然而，在我们的项目中，实验组中几乎不存在这种关联，智商与犯罪方面也是如此，不分男性和女性。也就是说，我们的项目打破了简单的代际依赖。

问题是这种项目适用于中国农村地区吗？因为项目的花费不菲，“初学者计划”每年在每个孩子身上花费2万美元，过于昂贵。大约八年前，我们在芝加哥召开了一场学术会议，部分与会者来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我们讨论了不同项目的优点，最终我们发现，这些项目发挥作用的原因都能归结到“育儿”这个因素，也就是让父母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不仅仅是在孩子小时候，而且要贯穿孩子的一生。这正是我们需要多加关注的基本要素。

比如，牙买加有一个项目，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针对父母的育儿方式进行干预。项目不是直接对儿童施加影响，而是与母亲交流。项目精心选择母亲教育水平相同的人员进行家访，指导母亲如何与自己的孩子互动。三十年后，与“佩里计划”和“初学者计划”同样，项目的效果在被试儿童30多岁时显露出了深刻影响。这些儿童在30岁时拥有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智商分数、更强的知觉推理能力、更好的心理测量结果、抑郁的情况更少、外向性更低、自觉性更强、专注度更高，并且上大学的可能性更高。原因仅在于童年时代每周和母亲在一起待的那一个小时。针对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的实验也是如此。

爱尔兰也有一个很典型的类似项目，得到的结果与牙买加项目高度相似。我们发现儿童的能力大幅提升，而且同样只是每周一小时而已，由和孩子母亲具有同等背景的人员上门家访，其中不涉及任何精英教育，花费也不昂贵。

因此，我们倡导在中国实施这一做法。我一直在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我们共同打造了一个名为“慧育中国”的项目，借鉴牙买加家访项目，每周进行家访，坚持每周对父母和监护人进行一个小时的育儿指导。

我们在甘肃进行了实验，并跟踪调查。截至目前，我们发现参与实验的儿童在四岁左右时的语言、认知技能和精细运动方面的发展非常乐观，效果与牙买加项目大致相同。牙买加家访项目的实验对象最大的已有34岁，暂定成本收益率为6:1或7:1，我们发现，“慧育中国”项目的增长轨迹与牙买加家访项目的增长轨迹大致相同。

这有什么好处呢？如我之前所提，在美国实施的计划每年在每名儿童身上的花费是2万美元，但牙买加和中国这两个项目只需要约5%的花费。“慧育中国”项目和牙买加家访项目中，每个孩子所需的费用大致相同，这是按年度折算的固定成本。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干预措施。比如中国也可以考虑学校项目。举例来说，美国有一所名为“雄心小学”的特许学校，参与项目的儿童中有些来自最贫困的社区。项目的具体做法是，给每名儿童发一张票证，中了彩票的儿童会得到一位导师，这位导师会一直陪伴指导孩子，不让孩子们放弃学业。结果发现，这些儿童的潜在特质纷纷涌现。

这背后的秘诀是什么？不管是在幼儿期还是后来时期，共同的秘诀都在于指导，或者也可以称为另一种形式的个性化教学。

小结

我不想给大家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认为只有在幼儿期才能进行有效的干预。这些幼儿期干预项目的效果的确很好，我们可以以此构建一个理论框架，说明早期干预与个人进步或成功的关系。但是，大量关于青少年的工作告诉我们，在青少



年时期进行干预，同样大有可为。因为青少年的执行功能、自控和决策能力正在发展，如果我们针对这一时期的青少年给予指导和建议，我们将获得充分的实质性成果。

我今天想传达的关键信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似乎非常温和，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项目，比如德国、哥伦比亚、印度，当然现在还有中国、牙买加和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形式的指导，不管是对母亲的指导，还是对孩子的指导，由导师为家庭教育提供补充，或对儿童提供帮助，都可以产生非常好的效果。我们需要认识到，个人发展是贯穿一生的过程，越早越能给孩子们带来长期的综合回报。当然，青春期也有干预的机会。因此我认为，指导是一种根据年龄调整的育儿方式。

作为总结，我想说明，人力资本是一个动态形成的过程，早期的干预十分重要。中国存在老龄化、城乡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等很多问题，从儿童时期就抓好技能培养，投入人力资本的干预可以一举多得，对化解很多挑战都有帮助。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生是一个长期成长的过程，早年的家庭生活对个人一生的发展都十分重要。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人的技术有高度的多样性，不只是智商和考试的分数，社会与情感沟通的技能也格外重要，而且技能会派生新的技能，还会提升下一代人的技能，对受干预者的兄弟姐妹及其家庭也都有好处，我们可以称之为动态乘数效应。而所有这些的关键所在，就是在早期建立父母或监护人与儿童良好的沟通互动模式，减少留守儿童状况的发生，期待引起政府和研究者足够的关注。

对话：教育的基本点与中美关系的难点²

詹姆斯·赫克曼 (James J. Heckman)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林毅夫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南南学院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如何实现教育公平？

林毅夫：非常感谢您支持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并带来充满启发性的演讲。我相信您的观点会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并会对中国教育改革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如何缩减人力资本的城乡差距方面。

我的问题是：美国不存在留守儿童问题，因为对人口内部迁移没有限制，而且据我所知，美国在教育政策上对城市和农村一视同仁。然而，问题在于效果方面，人力资本在城市的不同社区间的差距已经非常大，更不用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原因是什么？如果中国政府采纳并实施了您建议的改革，中国如何避免出现类似美国的问题？

赫克曼：我首先想说，非常高兴今天和你一起出席论坛。你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骄傲，我们都为你的成就感到自豪。你的观点一直引人深思并鼓舞许多人，我们也感到很庆幸能够为你的巨大贡献尽自己的一份力。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回到你的问题。美国存在城乡差异以及地域上的差异，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我再次强调，我对中国了解不够，没有资格深入评论，但据我上次在中国时的观察，在教育经费和教育支持方面，不同省份之间差距很大。

美国也有学区的概念，它是由不同家庭群体所支持的，而学校财政在很大程度上由该地区实际居住者的财富和其他考虑因素所决定。较富裕的人聚集在一起，不太富裕的人也聚集在一起，因此税基更低。例如堪萨斯州、肯塔基州或佐治亚州的一些偏远地区，人均消费更低，税基也更低。所以，地域间存在差异十分常见，这是由教育财政分散配置而导致的差距。我知道中国正朝着教育财政集中配置的方向发展，集中配置在美国政策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引起了广泛讨论。

美国还有一个问题，家庭结构不稳定，这在中国并不普遍。目前，我和暨南大学的冯帅章教授正在合作一个位于甘肃的研究项目。我们以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了解他们的父母给了他们多少钱，观察父亲的缺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发展。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但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家庭结构稳定度远远超过美国。美国有些人群，例如黑人儿童，他们当中约有70%至80%是非婚生子女，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很多单亲家庭缺乏中国家庭所拥有的那种支持和凝聚力。正是因为许多地方的家庭结构如此支离破碎，所以美国确实存在你所说的那些差距。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在美国被赋予政治意味，因为它涉及种族和阶级等因素，这掩盖了家庭结构极

2. 本文根据赫克曼教授与林毅夫教授2022年12月18日在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特邀对话整理。



不稳定的事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家庭结构很重要。中国的家庭结构受损害，主要是受人口迁移的影响。相比之下，美国更多是由于完整家庭不可得，也因此得不到相应的政策支持。这背后与社会文化及公共政策的历史渊源都有关系。在美国，家庭不完整以及家庭功能失调的问题正变得愈发严重。我确信这是问题之一，而且家庭的组成部分同样是关键所在。如何补充相关政策十分重要。

中国在家结构方面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中国家庭更有凝聚力，外出打工的父亲一般都会汇钱回家，让家庭保持完整。不过，这对留守儿童来说仍然是一个问题，需要通过政策解决。我提到的“家访计划”会有所帮助，但是在中国的大部分情况是父母双方都外出打工，留下来照顾孩子的往往是祖父母。问题是许多祖父母的教育水平很低，所以如何制定政策仍需要好好研究。

如何理解中国的共同富裕？

林毅夫：我想问的下一个问题是收入差距。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都是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中国政府最近提出了“共同富裕”，您是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思想家，我想向您请教，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社会如何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人人向往的目标？

赫克曼：技能培养非常重要。中国的一些不平等现象体现在城乡之间，这点可以从基尼系数、工资水平、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看出。因此，中国极大地增加了教育机会，教育机会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增长速度令人难以置信。按照目前的结构来看，我认为技能会赋予人们参与现代经济的能力。随着人口增长放缓，劳动力开始变少，技能溢价可能会提高更多，以至于熟练的人力资本可以替代更多劳动力。这种方式有助于消除收入差距。

国际劳工局以及西欧的许多类似组织非常想把西方福利国家的很多特点移植到中国，我们也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美国还有大量研究在探讨不平等的真正衡量标准是什么。令人不安的是，在美国，许多政治讨论其实建立在了错误的的数据上。当我们讨论美国的收入和不平等问题时，我们没有正确衡量所有现存的转移收入计划，比如收入所得税抵免计划、住房计划、各种医疗保险补充计划等。在谈论不平等问题时，这些计划都没有被考虑进去。我认为中国应该从美国吸取这一重要教训。

例如，最近有研究者做过估算，显示了这些转移收入计划的重要性。数据显示，美国收入最低 20% 的家庭工资在 2017 年是大约 4,500 美元，非常低，但他们实际获得的家庭收入是 49,000 美元，是他们工资的 10 倍以上。许多转移收入计划本质上就是在发钱，而这正是考虑不平等问题时常常被遗漏的部分。所以，衡量贫富差距时，如果是衡量最底层 20% 家庭和最顶层 20% 家庭的工资，的确差距很大；但如果衡量家庭收入，差距其实并不大。所以有学者研究指出，如果将美国的所有税收和转移收入都算进去，美国的税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系统之一，比经合组织的更先进。经合组织使用的增值税对穷人非常不利。实际情况是，底层民众，也就是穷人，得到的是负税，他们得到了转移收入，这种情况在过去 15 年里一直如此。转移收入计划被低估了。

对于中国而言，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目前的扶贫政策是通过转移收入计划，而不是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就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社会风气，人们会变得更依赖社会福利，而不是积极地去学习技能。

所以目前美国有个现象，也就是《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媒体所说的“大辞职”时代 (The Great Resignation)。疫情封控已经结束，但许多人仍然不愿回去工作。由于居家办公受到了极大的激励机制保护，许多人觉得居家更轻松，再加上最近两三年实施的转移收入计划，

让人们待在家里变得更容易，甚至更富有。这造成了很大的人力缺口，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然而，在美国很少有人讨论这个问题。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原主席阿瑟·林德贝克和瑞典经济学家乔根·威布尔等人研究过福利国家依赖性的增长问题，结论是：第一，美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平等；第二，没那么不平等是因为大量美国人享受了社会福利体系；第三，人们不想谈论这个问题。

我和合作者最近在探讨美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反激励效应。这个体系非常庞杂，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然而我们知道，即便在新冠疫情管控措施放松后，劳动力参与率也没有回升。所以我认为，问题在于社会将如何前进。我们真的想要一大群福利依赖者，而不是积极参与者吗？这是我目前非常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相关论文。

林毅夫：从您的观点中我了解到，如果想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提升技能，让每个人都有能力赚取收入。这是重要的基础之一。其次，关于收入差距，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可支配收入，因为包括转移收入后，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有时候比劳动收入差距小。在谈到转移收入时，我们还需要了解这对人们工作积极性可能产生的影响。中国需要吸取美国的教训，在其中找到平衡。

赫克曼：是的，在美国我们是吃过了苦头才发现这个问题。而且，由于美国现在的政治活动非常活跃，不同团体之间的争斗很激烈，所以事实被歪曲了。转移收入没有上报，这是美国人口普查的问题，是国税局报告数据方式的问题。实际上，美国政府一直在根据不当信息采取行动。我相信他们不是故意的，只是他们所获取的信息非常不足。

如何处理中美关系？

林毅夫：我想请教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中美关系。就GDP而言，美国是世界第一，中国是

世界第二。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对彼此很重要，对世界也非常重要，但现在中美关系并不乐观。我想问问您的想法，根据您的观察，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两国关系的恶化？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善这种情况？同时，您会建议两国政府实行哪些改善关系的措施？

赫克曼：我只能谈谈美国的情况。我见过一些政府官员，但我不能发表评论。美国现在存在民粹主义浪潮，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政党都有。马基雅维利在五百年前就提出并且现在正在实践的通用原则是——摆脱国内矛盾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在海外找到攻击对象。这种做法如今在美国政治中非常普遍，而且对两大党来说都越来越普遍。我不认为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多大区别，对于美国经济正在发生的许多问题，两届政府都喜欢责怪别国，尤其是中国。例如，在新冠流行之初将其称为“武汉病毒”。这种做法对防控疫情毫无用处，反而导致了一些非常丑陋的场面，比如美国人将怨恨转移到了亚裔美国人和亚洲访客身上。

美国有一批政客一直宣称中国是威胁，诬蔑中国盗取美国的技术，污蔑中国商品在进行低价竞争。有一个理论叫“沃尔玛效应”。大约十年前有一项关于沃尔玛效应的研究表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基本上是通过沃尔玛或大型批发市场销售，这事实上为美国的弱势群体降低了商品价格，所以美国消费者的实际收入由于购买这些商品反而上涨。

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奥特尔和瑞士的多恩等人指出，与中国商品竞争的行业出现了“失业效应”。我认为这是事实，然而大多数人仍在争论这个问题当中有多少事关贸易，有多少和技术变革、自动化等等有关。因此许多政客开始煽动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英国也有类似情况。英国脱欧就是把英国经济的问题归咎于欧洲大陆。可见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操作。民粹主义在许多民主社会中的影响很大。



找到一个“敌人”，尤其是自己国家以外的“敌人”，这真是一个很有效的政治手段。不幸的是，这种手段会激起许多仇恨。

许多美国人心里有一种恐惧，害怕中国越来越强大。我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某些方面已经领先于美国。我之前一直在跟一个深圳团队合作，后来由于疫情封控才暂停，我们研究的是用于学校监控等方面的通信和人工智能技术。中国人非常有智慧，但这也让美国人心生恐惧。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些技术都是中国从美国盗窃的。美国人持有这样的想法会让他们心里好受一些，但不利于两国建立贸易和合作意识。

问题是，从美国目前的政治氛围来看，短时间内应该摆脱不了对中国的敌对情绪，而且确实两大党都是如此。拜登政府非常强烈地发表针对中国的言论，这非常受美国产业工人的欢迎。他们认识不到与中国合作所能带来的全方位好处。现在看来，“全球合作”这个概念已经成为政治牺牲品。美国的不平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咎于中国。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但这并不能阻止政客们发表过激言论，而且这样做很受美国普通民众的欢迎。我们现在这样的学术交流是很好的，但美国普通民众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而且带有非常强烈的敌意。

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其实源于中国在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和高质量，所以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的一种含蓄的褒奖。但这又导致了丑陋的恐惧，而且我认为它不会很快消失。

林毅夫：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希望您的声音能在美国被听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个人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

赫克曼：是的。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站在一起，需要相互理解，这样才能达成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我一直在与中国的伙伴合作研究项目，比如我在演讲中提到的在甘肃研究的儿童早期干预项目，就是创造世界一流的人类发展科学的例子。我希望我们的对话和合作能持续进行。

对中国发展有何建言？

林毅夫：最后一个问题，您有很多中国学生、中国朋友、中国合作者，因此您应该很了解中国的优势和劣势。我也想过您的智慧了解，您认为什么政策改革对中国来说最重要？除了您在演讲中推荐的教育改革之外，还有什么有助于我们完善自己？

赫克曼：我建议更积极地反思中国当下“去中心化”的财政政策，多关注中国各地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其中缩水教育的呼声似乎是最高的。对此我做过一些研究，如果一个国家在财政上提供更中心化的系统，并以这种方式提供更多资源，将十分有助于消除跨地区的不平等现象，也将切实为每个国民带来机会。这是我目前可以预见的。

我还希望中国能创造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氛围。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让我担忧。尽管这确实增强了人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各国的竞争，带来更紧张的国际政治氛围，甚至是军事威胁。我认为各国应该在政治上进行更多合作，消除区域紧张关系。希望世界能朝着合作的方向去发展，远离目前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全球化”这个概念在出现之初就是想让各国从合作中互惠互利，它真正帮助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现在贸易与合作在减少，这对大家都很不利。

作为学者，我一直很喜欢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希望招收更多的中国学生，期待与中国合作更多的项目，因为我认为中国人勤奋努力，富有创意和智慧，而且工作质量标准很高。我非常喜欢中国，很想经常去中国。

林毅夫：非常感谢！距离1982年我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已经过去40年，每次遇见您我都学到很多。今天，我自己和论坛的所有参与者都获益匪浅。期待有更多机会与您交流和合作。

中美问题的根源来自美国国内³

安格斯·迪顿 (Angus Deaton)

201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国际事务荣休教授

非常感谢今天给我发言的机会。我主要讲三个方面：新冠疫情对个人、家庭和企业的影
响；中国和美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挑战；对未
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看法。

新冠疫情的影响

先从新冠疫情开始讲起。前段时间我去了苏
格兰，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我没有看到任何人
戴口罩。现在我在普林斯顿，戴口罩的人多一些。
美国不同地区的口罩佩戴情况有明显差异，特别
是在共和党主导的地区，通常不被鼓励预防措施，
有一位州长甚至公开取笑戴口罩的孩子。在另一
个我曾长期居住的州，立法机构禁止私营企业
对员工提出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

英国和美国大部分地区一样，人们似乎认定
疫情已经结束，生活可以恢复正常了。“正常”
并不意味着新冠肺炎消失了，它只是被视为一种
常见疾病进行治疗，就像感冒或流感。似乎很少
有人认识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已经有了实质性下
降，而且新冠发病率大幅度上升。

拜登政府宣布疫情已经结束，我推测他们的
意思是政府已经不想再对抗疫情了，并希望疫情
不再被当作一个政治性议题。因此，美国现在没
有监测新冠感染情况的国家系统，居家抗原测试
结果不需报给任何中央主管部门，仅有部分地区

做了污水检测。美国每日新冠死亡人数仍有 300
人左右。过去一段时间，死亡人群主要集中在未
接种疫苗的五分之一人口中，但最近则集中在已
完成疫苗接种的老年人群中。新冠病毒新变种的
致死率较低，但对疫苗的反应也变得不够敏感。

英国每天会对人群进行随机抽样检测，以便
迅速发现新一轮疫情的暴发，而美国却没有这样
做。按人口比例而言，英国的每百万人死亡人数
在 2021 年底和 2022 年初低于美国，但目前与
美国相似，尽管英国已近乎实现全民完全接种。
这似乎可以再次用疫苗效力减弱来解释。

中国的情况自然完全不同，政治制度使“清
零”政策的实施成为可能，这在疫情期间挽救了
数百万人的生命，因而理应获得广泛赞誉。但事
实上，至少西方媒体很少表示赞誉。累计死亡率
方面，中国较英国或美国几乎低一千倍。如果中
国采取了与英美两国相同的政策，死亡人数大约
会增加 300 万。

我认为记住这些数字非常重要，特别是目前
中国正面对着疫情后恢复常态过程中的困难。考
虑到产出的减少和种种不便，“清零”政策的成
本极高，尽管放弃“清零”政策会导致生命的损
失，但应该记住，如今的病毒远不如从前那么致
命。因此，中国恢复常态后肯定会比美国和英国
做得更好，至少中国在挽救生命方面成就卓著。

关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有一个方面讨论得较

3. 本文根据迪顿教授 2022 年 12 月 18 日在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特邀演讲整理。



少，那就是面对面交流的减少所导致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恶化。曾经，两国人民之间或正式或休闲的旅行不仅促进了商业和学术交流，还加深了两国对彼此发展情况的了解，而这种了解是很难通过视频会议实现的。

中美经济问题的根源

中美两国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其实大部分都与国际关系、国际协约无关，而是来源于本国国内问题，尤其是在美国。美国的部分国内问题与中国有关，但并非全都有关系。请容我稍作解释。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全球化一直是一股巨大而积极的力量。发达国家研发的医疗创新技术，借助更简单、更快捷和更常见的交流，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世界各地的预期寿命不平等现象大大改善。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一步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更多国家和地区走向繁荣。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中国绝非唯一受益的国家。

然而，贸易全球化却给发达国家带来了麻烦，特别是对于发达国家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而言。并且，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在美国，三分之二的成年人没有大学文凭，所以他们其实才是美国的多数群体，而不是少数群体。

在西方国家，政府、学术界和国际组织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往往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便部分美国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伤害，但世界各地其他更为贫穷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是大于这种伤害的。我自己也曾有过这种看法。全球平均收入增加，全球不平等现象改善，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称这种道德观为“世界优先主义”。这是一种世界主义，因为它公平地看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因国籍而有所偏袒；这又是一种优先主义，因为它给那些所得较少的人更大的优先或更多的重视。按此逻辑，尽管中国的输出品令美国劳动

者失业，使部分人群的利益受损，但这个世界总体而言依然比以往更加美好。

当然，那些失败者，也就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劳动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也没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且，作为受益者的中国人、越南人、马来西亚人或印度人在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没有投票权。所以，全球化在政治层面和世界优先主义道德观并不相匹配。

经济学家不愿意赞同贸易损害了美国人利益的观点。他们通常会说，哪怕确实有损害，那也只是短期的，失业者很快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尽管他们可能要为此搬家，况且美国劳动者还享受到了低价的中国商品。然而，由于包括技术变革以及城市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在内的多种原因，很多失业者其实并未找到更好的工作。

移民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20世纪60年代晚期之后，美国修改法律，接纳更多移民。新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这与美国传统的移民来源截然不同，以前的移民来自欧洲，主要是北欧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后来到美国的新移民人数超过了历史上移民的总数。现在，在美国国外出生的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近14%，创下了19世纪末以来的新纪录。经济学家宣称，移民的涌入对美国有益无害。世界优先主义的拥趸者也主张，即使美国本土居民的利益受损，但这些曾经一贫如洗的移民获得了更大的好处。多数工人阶层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美国人则再一次表示反对。

由于全球化和移民潮的影响，现在有大量愤怒、沮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发声被忽略。不仅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按实际价值估算，他们的工资水平下降了，居住的社区正在分崩离析，个人健康状况也在恶化。自1990年以来，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在25岁时的预期寿命已有所下降。拥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则持续增长，至少在疫情之前是这样，也许现在依然如此。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感到，他们被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居高临下地对待。这些精英从全球化和移民潮中获益，却拒绝承认他们的困境，反而告诉他们应该接受现实，说这是减少全球贫困所需付出的代价。但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这种对外援助不是他们自愿的，没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或许可。

在这种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成为特朗普政府针对的目标，以及为何中国现在仍不受欢迎。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中国自身的行为，而在于美国精英人士表现出的那种错误的居高临下的态度。

中国以及其他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和减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应被低估，但是，美国劳动者面临的困境也理应得到更多关注。这或许能通过更多抗议活动来实现，但这种做法存在政治上的差异，甚至遭到了工会的反对，因为他们更希望找到工作，而非获得失业补贴。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放慢贸易、移民和全球资本流动的进程。

我不认为人们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但精英群体对于他们眼中反民主的特朗普支持者仍然缺乏同理心，甚至态度变得更糟。这将使任何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都难以实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在很多场合都遭到了蔑视和欺骗，所以他们很难相信这些政策有实施的必要。在最近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所达成的关于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协议，将被视为又一次非自愿的对外援助，而且，代价将由那些坚决反对对外援助的普通劳动者支付。更不用说这一协议事实上不会对减少排放起到任何作用。制订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时，必须保证大多数美国人能从中直接受益，比如使用积极的激励措施，而不是消极的惩罚手段。恢复工作既不

轻松，也不快速。放宽旅行限制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尽管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需要改变，我认为改变正在发生，尽管速度缓慢。至少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他们对贸易的看法是错误的。而承认移民问题上的错误认知更为艰难。拜登政府与美国工人阶层的联系强于前几任民主党政府，并且在努力提升人们对贸易相关问题的认识。如果这些内部的变化在美国生根发芽，将减轻中国和中美关系所承受的压力。

国际经济格局与未来

最后简单说说国际经济格局。早日结束俄乌冲突将对很多事情大有裨益，比如，能源价格降低能让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日子好过一些。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态度并不积极，但也可能对紧张局面不利。

中美分歧导致部分贸易转移，比如，美国制造商将生产线转移到第三国，而中国将出口产品输送到美国之外的其他地区。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损失，但不太可能消除损失。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其原因和合理性，有些变化可能不会轻易变回来，比如，当固定成本触及上限就会考虑转移，而且在新地点获得的成果很可能优于原本的预期。未来，资本的流动可能会更加受限，这种情况比贸易受限更可取，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事实上，这甚至可能带来益处。

我主要想说，中美经济关系所遭受的大部分伤害，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咎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精英群体对于本国普通劳动者所处困境的无视和轻蔑。



对话：美国的真正困境与中美关系的挑战⁴

安格斯·迪顿 (Angus Deaton)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国际事务荣休教授

赵耀辉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为什么美国白人蓝领阶层的地域或职业流动不畅？

赵耀辉：很荣幸和您进行这次对话。您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中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是美国国内矛盾。问题的根源是没上过大学的白人蓝领工人所面临的困境。您在《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本书中以令人信服的事实揭露了许多白人蓝领工人的凄惨现状，指出自杀或吸毒过量是导致该群体预期寿命下降的重要原因。您还提到，有研究将该群体的惨状归因于制造业岗位被大量取代，但事实上，其背后的原因是全球化、移民和全球资本流动。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多年，而您是第一位在书中讨论他们死亡率上升这一现象的人。然而，美国的精英阶层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他们反而将矛盾焦点转嫁到中美关系。

您这些见解对中国很有帮助，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为什么会反华。许多中国人愤愤不平，认为美国是嫉妒中国，但正如您所说，美国人民正在经历真正的苦难，部分原因是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带来的冲击，当然还有其它原因，例如技术变革和机器人的普及等等。

我非常喜欢您写的《大逃亡》这本书，书中记录了贫困国家脱贫的过程。实际上，全世界很

多国家，尤其是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不仅物质收入增加了，人口健康水平也大幅提高，国家之间健康差距越来越小，因此全球化使我们获益良多。在相对贫困的国家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美国整体来看也受益，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却因此受损。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体谅他们的困境，也有助于中国应对全球化趋势的逆转。2020年5月，中国政府提出双循环政策，包括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该政策的出台意味着中国承认之前对国际市场需求过度依赖，现在需要给国内消费市场更高的优先级。最近，政府又在强调扩大内需，表明中国已经意识到全球化进程正在放缓，并积极为此做准备。

您对美国工人阶级困境的分析也为中国敲响了警钟。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通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避免了许多社会问题，但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未来某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降至与当今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甚至更低。如何不重蹈美国的覆辙，对我们来说显然很重要。

我的问题主要围绕美国的现状，但这些问题也将启发我们对中国未来的思考。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白人蓝领阶层不进行职业或地域流动的调整？因为从经济学理论来看，一旦失去旧的工作岗位，劳动者就会转向其它岗位，比如调换

4. 本文根据迪顿教授与赵耀辉教授2022年12月18日在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特邀对话整理。

行业、提升技能，或者迁移到其它地区。您提到，这在美国行不通。但在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运作良好，当人们受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等外力影响而失去工作时，劳动者似乎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口，他们会通过搬迁寻找好工作，并愿意调整工作的行业。总体而言，美国人口的流动性也很强，我看过一些关于流动率的数据，美国每年的跨州人口流动保持在相当合理的水平。为什么美国白人蓝领工人不去通过流动进行调整呢？有没有相关的调查数据，比如密歇根大学的收入动态追踪调查，可以反应他们居住地点是否变化，或其它反映这些美国人生活状况的信息，从中可以研究他们生活中的哪些因素阻碍了他们的职业和地域流动？

迪顿：传统上美国人认为，如果你没有在理想的地方找到工作，就可以搬到别的地方找工作。但现在这种认识已经相比过去有所下降。正如你所说，人口流动率仍然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但已经不如从前。我认为我们只了解其中的部分原因，也就是很多人的家庭成员也都有各自的工作，成员的多个工作共同支撑一个家庭，因此如果单个成员失业，让全体家庭成员都和他/她一起迁移到其他地方找工作的可能性就更低。在我小时候，我叔叔本来在苏格兰的铁路部门工作，那份工作的报酬不够养家，他还是一家农场做兼职。他妻子也有一份工作，是帮邻居洗衣服。后来铁路关闭了，我叔叔就带着全家人移民去了澳大利亚。这样的事在今天可不像当年那么容易，时代不同了。

我认为人口流动性降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城市越来越不宜居，发达城市的生活成本变得非常高昂。这种情况在中国比在美国要更容易控制一些。此外，地方保护主义也是一个因素。不知道中国是否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也就是人们不希望外来人口迁入他们的城市。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城市有规划管制，不允许建造更多房屋，导致房价过高，所以对那些学历很低的人来说，要想搬到那些城市很不容易。还有一个原因，很多失

业的人的确不具备较高的技能水平，可能没受过多少技术培训，甚至可能不知道如何使用电脑或互联网，所以与过去相比就更不容易在发达城市找到工作。

我讲过很多次，真正的原因是那些高学历精英把其他人拒之门外。他们的想法是：“我们住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城市，走开，我们不需要你。”我认为这也是阻碍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而且非常重要，所以我在研究此类问题时也在试图寻找答案。

为什么很多美国人上大学困难？

赵耀辉：我的第二个问题关于教育。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或 90 年代初以来，美国的教育回报率一路上升，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回报率。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应该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去接受大学教育。然而现在美国的大学入学率似乎不再上升。中国的大学入学率已升至 53% 以上，美国似乎只有 40%。这是大多数中国人不太理解的。对我们来说，把孩子送入大学是家长的第一要务，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不惜付出一切。中国的大学入学率仍然不够高，这是由于供给短缺，因此需要根据每年的高考分数分配名额。美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大学学费对大多数家庭来说理应是问题，但我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四分之三的美人认为上大学太贵，超出了他们的负担水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应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

迪顿：没错，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我和安妮·凯斯写《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本书时，令我们震惊的事实之一就是大学学历溢价如此之高，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其工资显著高于那些没上过大学的人。正如你所说，我们都学过经济学，我们知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应该有很大的动力去上大学。但是为什么大学入学率并没有提高？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太多想说，在这里我只说一两点。



我认为其中一个问题是费用，美国的大学学费变得非常昂贵，送孩子进入一所顶尖大学要花费大约 25 万美元。当然还有助学贷款的问题，这已经成为美国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高学历美国人和低学历美国人之间的矛盾问题。关于教育成本过高的问题，我觉得美国的所有大学教师也对此负有一部分责任，因为我们的工资上涨了很多。当我决定成为一名学术工作者时，我的目的并不是以此致富。然而大学提高了收费，而我们也获得了高收费带来的红利。就像发达城市的居民享受着城市发展红利的同时会阻止其他人迁入一样，当大学溢价高的时候通过提高收费也对大学教育形成了一定的阻碍。除此以外，许多大学生不能毕业，因此大学毕业率更低。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辍学的人最终不仅负债累累，而且还没拿到学位。

不过我还要说一件事，大家喜欢拿我们苏格兰人和中国人对比，因为我们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我父亲自己没有受过教育，而他在教育上的投入令我受益终身。每一个希望读大学的人都应该获得机会。难道人人获得大学学历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吗？大学学历被我们赋予了一些附加价值，比如尊严和社会地位，而很多其它的工作现在已经不受尊重了。当我和安妮审视美国的现状时，发现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不受尊重，而这本来是不该发生的。过去，人们能通过多种途径过上尊严的舒适生活，不一定非要上大学。降低大学学费，同时不以收入决定社会地位，给所有人尊严，可能都有助于解决工人阶层面临的困境。

我对美国现在关于减免助学贷款的政策争议和讨论并不认可。美国有高度发达的高等教育市场，但为什么市场竞争没有使学费价格降低呢？我们不妨以常春藤盟校为例来考虑这个问题，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或哈佛大学，它们显然是很难考取的，而且，这些学校有其特殊地位，尽管不能称之为垄断，但它们的确不可替代，因为你不可能复制出另一个普林斯顿大学。这可能是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美国的大多数普通大学都不难报考，只要有高中文凭基本上都能录取。这些大学真正的难题是教育的质量不高，但是成本并不低。

对此，我已经撰写两本书，一本是我自己写的《大逃亡》，另一本是和安妮一起写的《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然而，每次写到书的结尾时，我都感觉自己对教育的了解仍然不足。

政策如何救助蓝领群体？

赵耀辉：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问题，您认为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去帮助这些蓝领群体？您提到了救济，但有趣的是，反对福利和住房保障政策的也正是这个群体，对吗？这个群体对救济的态度是否开始有所转变？

迪顿：工人阶级不喜欢救济的原因是，如果工厂由于技术变革或全球化之类的原因而倒闭，导致工人失业，那么经济学家会建议政府给他们提供救济，但工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工作，而不是补偿性的工资。工会将这种救济形容为“丧葬保险”，意思是这仅确保能支付工人的丧葬费用，而无法保住他们的工作。

所以我讲过多次，如果我们能针对国际贸易采取更好的处理方式，比如稍微放缓其发展进程，这些问题也许就不会如此严重，因为人们会有更多的缓冲调整时间，不会这么快就失去工作，也不会把他们的困境归咎于中国。我认为拜登政府比上一届政府，甚至比上一届民主党政府都更了解这一情况。

此外，还有很多关于预先分配(pre-distribution)的讨论。预先分配指的是通过改变市场来保住工人的工作，而不是事后提供补偿。至于全民医保，我认为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医疗行业。美国的富人基本都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但考虑到美国的政治制度，全民医保是非常难以实现的进步。在美国，医院和医疗行业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医疗改革很难朝这个方向进行。也许可以建

议私人资本退出医疗保健系统。美国的很多监狱，尤其是关押非法移民的拘留所，都由私营公司经营，难免会有盈利至上的冲动。另外，美国的许多救护车服务都归私人股本所有，他们是美国东西海岸相当富有的投资人。他们对救护车服务收取的费用高得离谱，而支付费用的人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以上这些都是严重的乱象。我相信人们都明白，要想扭转当前的局面，这些方面将是很好的切入点。希望我们有能力识别出一些本不应该被资本渗透的领域。就算不废除资本主义，我们肯定也能打造一个更加友好的资本主义体系，禁止人们在这些非常敏感的领域牟利。然而，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如果很容易做到，我们一开始就不会陷入这个困境。

如何理解和应对中美关系？

赵耀辉：关于中美关系，您在演讲中说中国能做的事情可能不多，因为矛盾主要源于美国国内的问题。但中国很难不做出反应，否则人们会认为政府太软弱。由于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以及国际合作受限，一些从中美合作项目中受益的美国高学历精英阶层也对中国有怨言，这令人遗憾。中国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已经放开，从疫情中走出来的中国应该做些什么，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过去三年中，中国与世界增加了隔离，整个世界也都发生了巨变，国际环境对中国的敌意比以前大得多。我们的政府正在逐步接受全球化滞缓的事实，也在积极准备以应对这一变化。那么根据您对美国国内政策的分析，中国应该如何改善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尤其是在美国工人阶级心中的形象？

迪顿：我认为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也时常思考这个问题。你在一开始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宽容和理解十分重要。当某个合作伙伴对你产生敌意时，如果你意识到他自己其实也受到了伤害，那你会更容易体谅他，而不会像不

理解的人那样去报复他。所以，部分出于这个原因，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发言，并说出这些话，希望中国能够理解。事实上，中国也确实理解，中国贸易产生的影响并非对所有美国人都有益，有一部分美国人对此很不满。了解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你也谈到了双循环。我认为这是中国为了自身利益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大幅提高国内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这将带来很多好处，中国人民将会更多受益。“双赢”本来是不喜欢的一个词，因为它通常意味着相反的意思，但我认为双循环的确会带来双赢的局面，不仅中国人受益，其他国家的人也会受益。所以我认为双循环十分重要。但我知道实施起来很难，要在中国国内做出这些改变并不容易。

你也提到了新冠疫情管控措施的放开，我认为这极其重要。我们本来应该在北京面对面进行这次谈话，而不是以线上会议的方式进行。当然我很高兴能与你在线交流，但如果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会更好，将使我们的讨论更加富有成果。

如何走出疫情的心理阴影？

赵耀辉：最后一个问题，美国工人阶级面临的危机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那么精神健康危机的出现还有其它原因吗？失业的成年工人是抑郁症高发群体，但抑郁症在中学生和高中生中也相当普遍。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很多孩子也有心理健康问题。当然，新冠疫情加剧了人们的压力，这种情况已经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您对此有哪些思考？

迪顿：是的，这个问题涉及一些缺乏科学解释的事情。关于危机带来的身心健康问题，你我二人都将对此进行很多研究。生理健康问题可能源于很多因素。例如，抑郁症和自杀的发生率近年来都大幅提高，但我们还不太清楚这些疾病有多少是生理上的，多少是非生理因素造成的。一



些生理上的病症可能由社会地位下降、失业或归属感的丧失所引发。当生活环境分崩离析时，当自尊或民族尊严受打击时，也正是人们疾病高发之时。这既可以说是生理疾病，也可以说是精神疾病。因此我和安妮倾向于认为，一些生理上的疾病同样也是引发精神疾病的原因，而且如果父母过得不好，孩子也会遭遇困境。生活在衰败环境中的父母很难像生活在正常环境中的父母那样，以积极乐观的方式来抚养孩子。新冠疫情暴发后，

英国精神疾病的发生率大大增加。这是令人担忧的迹象，而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原因。

赵耀辉：很高兴听到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您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您的见解让我受益匪浅，相信我们的听众也能从这次对话中获得启发。希望 2023 年我们能有机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迪顿：你提出的问题都非常深刻。你主导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已被时间证明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期待再次交流。



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和改革的要点⁵

余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党的二十大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本届论坛聚焦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我认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结合论坛的主题，围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我谈两点看法。

一、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和动力何在

近年来，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问题突出。站在中国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要好好研究下一步中国发展的动力和空间何在。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把世界上所有

的国家分为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21年，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起点为人均国民总收入13205美元。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2440美元，与高收入国家的起点相比仅相差765美元。2022年以来，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及一系列超预期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处在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较低水平，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略高于3%。美联储为控制通胀，年内已经连续7次加息，累计加息425个基点，这导致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它货币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预计全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10%左右，因此2022年以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与高收入国家起点的差距可能会有所扩大。但随着经济增长回归潜在增长轨道，未来两年内，我们人均国民总收入翻越高收入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大概率事件。

与已经进入高收入的国家相比，我国在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补足差距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也是现代化新征程上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5. 本文根据余斌副主任2022年12月18日在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特邀演讲整理。



首先，看供给结构。所谓供给结构就是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供给结构中，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202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53.3%，而高收入国家平均为71.8%，美国达到80.1%，也就是说美国GDP的80%来自服务业。

我国服务业领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新型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服务业包含的领域很广，因此哪些才是发展的重点？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明确指出，未来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方向是生产型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当前，我国生产型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竞争能力不足，并且主要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所以未来的方向应当是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生活型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这是因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特点是消费的个性化、高端化和多样化。

其次，看需求结构。所谓需求结构就是投资占GDP比重、消费占GDP比重和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在需求结构中，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明显偏低。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55%左右，高收入国家平均为76.9%。消费又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占的比重较低且相对稳定。剔除政府消费以后，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足40%，而高收入国家平均接近60%。高收入国家的这两个指标都比我国高出20个百分点左右。

消费也可以分为实物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2021年，我国实物商品销售额仅相当于美国的92%。美国服务消费的规模比中国大，如果再

加上服务消费，我国跟美国在消费市场规模上的差距就更大。美国只有3.3亿人口，但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我国消费占比低，消费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消费能力不足，也就是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两会闭幕答记者问时讲到，我国居民月收入不到1000元的有6亿人。为此党的二十大提出“两个提高”和“两个规范”的要求，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所谓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进行分配，从而形成政府所得税收、企业所得利润和劳动所得工资。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过低，因此要提到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结束以后政府会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整，从而形成国民收入分配。因此，也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是“两个提高”。

“两个规范”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收入是流量，要规范收入分配次序；财富是存量，要规范财务和累积值。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突出位置；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利因素，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财富分配差距的逐步缩小，我国将从全球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演变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将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奠定良好的市场基础。

最后，看城乡结构。在城乡结构中，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比重过高。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达22.9%，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只有3%，美国只有1.4%，以小规模经营为主的日本也仅为3.4%。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

然在农村，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很显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三个办法：一是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二是通过竞争优胜劣汰，避免过度竞争、恶性竞争，把生产和市场向优势企业转移，由此提高行业的集中度、竞争力和创新力；三是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农业生产从主要依靠投入劳动力，转变为适度规模经营、机械化、现代化，从而将低效率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高效率的非农产业部门转移，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总之，随着我国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的调整优化，与高收入国家不断缩小差距，将释放出现代化新征程上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二、新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在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式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未来五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基本形成。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比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系统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

就优化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而言，则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有序流动，需要提高两个比重，也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还需要深化服务业改革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等等。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突破才能解决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梗阻，不断释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与十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比，新阶段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1.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国家安全风险凸显。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把安全上升到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二十大也提出，要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很显然，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突出强调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也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因此，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就需要在公平、效率和安全这三者之间取得新的平衡。

2. 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充分吸收和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构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在过去 40 多年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沿着这一方向在不断推进，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为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



期稳定这两大奇迹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需要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3.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

府作用。新阶段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有效解决社会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转型的问题，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增强社会自我净化、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因此，新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需要从政府与市场的二维思维转向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共治格局，从而形成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和谐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历史方位和关键点⁶

刘伟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之所以是关键时期，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 一、党的中心任务的历史转变期；
- 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深刻变革期；

三、实现 2035 年总体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十四五”达成目标和“十五五”开启实施的交汇期；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

- 五、承受经济下行压力空前的冲击期。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未来五年主要的目标和任务，尤其是经济发展上的目标和任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历史性转变期

如何认识未来五年的关键意义？特别是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未来五年具有怎样的意义和特殊性？这些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探索，尤其需要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总结长期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实践中的规律性认识，认识并遵循客观规律，科学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

展理念，这是实现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走好这一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要紧紧抓住开局起步的关键期，这是未来五年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的历史方位，具有极为重要和特殊的时代发展意义。

二、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深刻变革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未来五年恰是我们认识适应，进而把握这一特殊时期的关键五年。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动能的变革、结构变革、质量变革带来新机遇，但也形成更为严峻的竞争态势，并带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科技创新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不确定性，特别是未来五年是我国科技进步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深刻演变，党的中心任务历史性转变。随着我国距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日益接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必然会更加尖锐、更加复

6. 本文根据刘伟教授2022年12月18日在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闭幕演讲整理。



杂，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未来五年要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健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经济发展基础，而我们将面临一系列从未遇到过的新的发展难题，尤其是一系列结构性矛盾。

未来五年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不断加剧的时期。从全球化进程看，我国在全球的地位不断上升，为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战略新机遇。从世界经济结构看，亚太地区与发展中国家重要性的提升为我国发展带来更多的战略合作空间。从国际权利格局看，美国霸权的日渐衰退，客观上约束了对我国发展的外部战略压力。从全球治理体系看，发展议题与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纳入世界主流治理逻辑，增加了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战略话语地位。从科技产业发展潮流看，新技术革命在带来不确定的同时也为我国动能转换、弯道超车带来新的战略重构机遇。

正如二十大报告所分析的，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地缘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三、实现2035年发展总体目标的关键时期

未来五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完成并进入“十五五”规划时期。“十四五”规划目标的达成与“十五五”规划目标的确定及实施，对实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第一步总体目标具有开局意义。中共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总体目标和进程做了总体战略安排，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五年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就经济发展而言，未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要显著上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取得重要进展。也就是说，未来五年要为2035年人均国

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下经济增长基础；要为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创造科技自立自强打下基础；要为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四化”奠定阶段性发展条件。

就体制机制创新而言，改革开放要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基本形成。也就是说，要为2035年建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现代经济体制做出实质性推动。

就人民生活而言，要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也就是说，未来五年要与2035年要求达到的民生目标保持一致。

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的攻坚期

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上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取得重要进展。要取得高质量发展新突破，意味着未来五年将是共克时艰的攻坚期。

所谓高质量发展，是以需求与供给高水平良性互动为基础的均衡发展；是以强劲和可靠的国内大循环为基础与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开放性发展；是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保障，以产业链、供应链和生产再生产畅通为特点，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主要动能的安全高效发展；是以补齐城乡二元经济和区域布局不合理短板为重要任务的协调发展；是以国民经济各方面量的指标合理增长和经济结构等质的指标有效提升的有机统一的合理发展。

在未来五年，能否取得高质量发展上的新突破，对于 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迫切需要贯彻实施的主要战略举措包括：

1.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4.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5.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显然，要完成上述战略性任务会面对严峻挑战，未来五年作为开局起步阶段也是克服各种困难，应对各种挑战的攻坚期。

五、国民经济承受各种超预期因素叠加，形成空前严峻下行压力的冲击期

从“十四五”经济发展目标和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要求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需要保持在年均 5% 甚至更高。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甚至比 2020 年时更为严重。微观基础、市场预期、循环速度、外部环境和政策空间等各方面都比 2020 年更不利，挑战更严峻，经济面临的新风险不断加剧。

1. 疫情反复、多点发生的情况对经济产生更深刻地冲击；

2. 美联储、欧央行加息超预期，可能引发全球新的金融动荡并加大世界经济进一步衰退的风险；

3. 俄乌冲突等国际关系出现新变化并可能产生强烈的外溢效应，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4. 房地产政策调整短期内难以扭转下滑趋势，存在三角债集中爆发的风险；

5. 出口高速增长可能难以维系。2022 年 10 月和 11 月出口数据已经显现出下滑态势，在存在三角债集中爆发风险的同时，支撑因素不够有力；

6. 产业链、供应链存在外移内缩的风险；

7.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有可能集中暴发并形成系统性风险；

8. 非金融企业信用风险演变可能引发新的风险；同时，在全球金融市场联动下，我国资本市场也存在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2022 年和 2023 年是“十四五”的关键年份，也是攻坚克难的关键之年。宏观经济指标及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能否如期如数达成，对实现“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大政策力度和协调性，使得 2023 年整体经济增长尽早回到正常区间，从而为今后五年的开局打好基础，并抓住未来五年这个战略关键期，为我们 2035 年实现现代化第一步战略总体目标打下阶段性的坚实基础。



信心和科学是 2023 年中国经济的关键⁷

姚洋

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北大南南学院执行院长

2022 年，中国经济增长不力，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甚至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到 3% 左右。因此，我在此想重点分析一下中国经济 2023 年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增长潜力问题。

最近，日本有一个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唱衰中国。这份报告指出，以前曾经预测中国将在 2033 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现在这一预测需要更正，因为中国很有可能永远赶不上美国。

这让我联想到 2022 年 8 月 Lawrence Summers（劳伦斯·萨默斯，美国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在接受 Bloomberg（彭博社）采访时也曾把中国比作上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他表示，当年也有很多人预测日本的经济总量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这一预测至今没有发生，所以中国很可能也做不到。Summers 的论断有很明显的基础错误，因为日本与中国的人口规模不同。日本的人口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日本如果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人均收入要达到美国的三倍以上，这确实不太可能。中国的人均收入只要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甚至不到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就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些言论都不够科学，但影响很大。因此，

我以此为切入点，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到底还有多少，另一个是如何才能改变当下的增长不力状态，让经济增长潜力得到释放。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为 5.5%

我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测算分为两部分：资本积累与 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资本积累主要看储蓄。中国当前的储蓄率仍然保持在 45%，生产性资本存量是 GDP 的 3.6 倍，所以每年资本的增长速度是 12.5%（45%/3.6）。同时，由于中国基础设施的年份比较短，折旧率可以按 5% 扣除，由此得出每年净资本增速为 7.5%。而资本对生产的贡献是 50%，因此可以算出资本积累对于潜在增速的贡献是 3.75 个百分点。这一数字可以作为估算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基础。

在 TFP 增速方面，很多人认为我国过去十几年的 TFP 增速接近 0，甚至为负，我对此表示怀疑。TFP 按照索罗残差的算法是高度顺周期。过去十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速下行，所以 TFP 的增速肯定也要下行，但如果说这期间我们完全没有技术进步也不可能，因此 TFP 还没有降到零。过去十几年，大量企业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

7. 本文根据姚洋教授 2022 年 12 月 18 日在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国新征程”环节的演讲整理。

创新研发，中国市场诞生很多“隐形冠军”，所以技术进步肯定大于零。

但 TFP 的增速到底是多少？这难以测定。根据历史文献的推算，TFP 增速通常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贡献为 20%-40% 不等，以此为上下限，即可反推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如果以低限 20% 计， $3.75\% \div 0.8 = 4.6\%$ ；如果以上限 40% 计， $3.75\% \div 0.6 = 6.2\%$ 。因此，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就在 4.6%-6.2% 之间，取平均数值即为 5.5%。我的估算就这么简单，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为 5.5%。

由此可见，最近日本公布的预测结论完全可以忽略，由此线性外推的结论也不可信。

2023 年经济增长需要信心和科学

中国经济 2022 年的潜在增速应该也不低于 5.5%，但事实上只实现 3% 左右，存在一个 2.5% 左右的缺口。这也是很多人对 2023 年的中国经济不太乐观的重要原因。因为人们有理由担心制约中国经济 2022 年增长的因素在 2023 年不会完全消失，而且可能还有新的超预期因素干扰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经济 2023 年和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速，我并不悲观。这不仅仅因为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测算，还因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干扰因素正在消失。

第一是病毒的演变和防控政策的转向。中国经济 2022 年不及预期，最重要的干扰因素就是疫情。目前来看，病毒的演变虽然还没有终止，但这一年多，其毒性已经相对稳定，使疫情防控

放开具备了基础条件。随着二十条和新十条的出台，各地陆续达到感染高峰，无论是我们身边的北京市，还是全国，感染率迅速上升，疫情快速走向高峰，然后会从平台期转向下降期。春节之后，疫情有望进入新的稳定期，经济和社会活动将有望得到全面的恢复，对中国经济增长扰动最大的因素将告一段落，我们有理由对明天和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恢复信心。

第二，政策出现更具科学性的调整。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增长”排在第一位，这不仅再一次释放对经济增长的重视和发展经济的信心、决心，改变了发展的策略。一方面，2023 年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要加力增效，相对会比较宽松。另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促消费”摆在首位，意味着政策要在需求侧发力，这在以前并不多见。这样一来，经济就能实现完整的循环，而不再局限于供给侧和保市场主体。如今，各地已经在酝酿发放新一轮的消费券，只是规模还小。我期待中央政府 2023 年能在消费领域真正有所成就，敢于推出显著性的举措，比如在地方债里切出一部分发行“消费国债”，这样促消费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鉴于此，在我看来，中国经济 2023 年达到潜在增速的挑战不大。如果政策能够更加宽松、积极、科学、精准，比如有力地扭转房地产行业下滑的趋势，让它从负增长变成正增长，则中国经济 2023 年不仅有可能把 2022 年低于潜在增速的缺口补上，还能为十四五规划的完成和 2035 远景目标奠定更好的基础。

因此，对于 2023 年的中国经济，我们有理由充满期待。



对“扩内需纲要”的几点认知⁸

夏斌

国务院参事室原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国家发展论坛本届的题目是“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我们这个环节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新征程。中国经济的新征程要怎么走？怎么落实？

2021年，国家正式公布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内容路径有了全面布局和要求。最近，国家又出台《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以下简称“扩内需纲要”），我认为这是新征程在扩大内需方面的补充或扩展。对于这份“扩内需纲要”，我谈几点认知。

1. “扩内需纲要”的内容极其广泛、丰富。全文有两万多字，11章38节，其中有31节的内容都直接与经济工作、扩大内需相关。进一步看，扩大内需的具体任务加起来有好几千项。30余节内容所列的各项任务涵盖了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各项日常工作。在我看来，这一“纲要”就是一份“小号版”的《2035远景规划》。

2. 这是一份经济工作纲要。我通读了两万多字的文件内容，从头到尾都是对未来各项经济工作定性的、描述性的分析和要求，用的多是“鼓励”“支持”“推进”“提高”“增强”“完善”“扩大”“强化”等方向性的、定性的词汇，没有具体的比例和数据等量化指标去要求每年的工作怎么落实。从2022年到2035年还有13年时间，几千项工作任务要分几步实现？每年的工作任务

是什么？各部委年初的工作安排是否要对照“扩内需纲要”计划来落实？……我从这份“扩内需纲要”中没看到如何落实任务的具体要求。

3.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全社会的融通资金包括财政资金和金融资金，而财政资金在其中的占比微乎其微，所以主要应该利用信用形式融通的货币资金。但在这份内容如此丰富的“扩内需纲要”中，定性描述的任务过多，多达几千件，大多涉及到资源要素配置或重新配置，其中以财政资金为主，但对其它资源，尤其是金融资金的总量、结构、分时段配置等内容仅在个别段落就投融资问题和信用的一般性要求有所描述，占比严重不足，恐怕“扩内需纲要”任务最后要落实起来会有困难。

4. “扩内需纲要”的内容这么丰富，除了需要研究这些内容如何操作外，还需要考虑这些任务最终要不要检查？如何检查？怎么监督？等等。我认为这是要实现“扩内需纲要”任务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完成新征程必须要有的建构机制。

总之，我们要以扎实的步伐走上新征程，要有理想，要鼓舞士气，更要实事求是，少讲空话；既要重规划，更要重操作性，让理想可落实，能督查。

8. 本文根据夏斌教授2022年12月18日在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国新征程”环节的演讲整理。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旧法宝与新对策⁹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尤其是房地产业有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问题。应该说，过去这些年决策层一直高度重视金融风险。

当下中国金融面对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如何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的力度；二是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大型金融风险一旦发生，对一国的影响不仅是短期的，更是长期的。很多学术研究也得出近似的结论——严重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长远大事。

两个旧法宝

过去40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金融形势都比较稳定。“比较稳定”指的是没有发生过系统性危机。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初30年情况比较稳定，原因是我们有两个对抗金融危机的法宝，一个是政府兜底，另一个是经济持续高增长。

“政府兜底”意味着万一金融出问题，由政府兜底来稳住投资者信心，从而避免恐慌和挤兑。“经济持续高增长”意味着可以在发展中化解风险，解决问题。

过去几十年，中国对于曾经出现的金融风险问题都是以此化解。最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银行的不良率当时超过30%，但没有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平稳过关，与上述两个法宝密切相关。

2015年至今，我国也陆续出现过不少金融风险事件。到目前为止，情况最稳定的当属大中型商业银行，包括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及个别城商行，共约20家。其他的金融机构陆续出现过金融风险事件。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一再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方面的工作确实面临不少挑战。一旦失守，我国经济增长必然会遭受重大挫折。

三条新对策

但是怎样才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但可以重点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策略。

第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金融领域尤其如此。市场化改革要抓住两个“牛鼻子”。一是要尽快出清“僵尸企业”，不能一出现问题就由政府兜底，否则风险会越积越多，且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因为反正有人兜底，相关企业对防范

9. 本文根据黄益平教授2022年12月18日在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国新征程”环节的演讲整理。



风险缺乏警觉性。市场如果缺乏好的、明确的金融纪律，出问题不能出清“僵尸企业”，风险必然累积。二是政府应尽量减少压到金融机构和企业身上的强制性、政策性任务，政府与市场之间要有一个清晰的界线。举例来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什么我国银行的不良率非常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危机发生前，政府要求银行发放了很多“安定团结贷款”。这些政策性贷款不具备商业可持续性，诱发不良和坏账。如果一些政策性的金融任务确属必要，政府向金融机构和企业派出任务后应配套相应的后续机制，将来一旦出现问题，政府和金融机构要分担责任，不能把责任完全压到金融机构身上。

第二，要把监管落到实处。我们的监管框架很完整，人员、机构、手段、规则一应俱全。尽管如此，还有很多地方的风险没能管住。中小银行的很多问题一般是大股东或董事长胡作非为所致，再往下追究就是监管没有落到实处。

如何把监管落到实处？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1. 针对金融监管的目标给出明确清晰的界定。金融监管的目标应该是保障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持金融稳定。应该把支持宏观经济稳定、支持金融行业发展的责任分离出来，使金融监管的目标相对简单清晰。

2. 金融监管工作的专业性比较强，政府可以考虑给予金融监管部门一定的权限，由监管部门进行一定程度的自主决策。

3. 引入问责机制。监管部门做得不好要被问责，就算大家没做好也都要坚持问责，不能法不责众就不追究监管部门的责任。

此外，监管框架也需要做两方面修正。

1. 过去以机构监管为主，“谁发牌照谁监管”。然而在当前金融创新蓬勃发展，交叉业务和混业经营越来越多的背景下，恐怕要考虑机构监管、功能监管和审慎监管并重，尤其要突出功能监管。

2. 考虑借鉴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双峰模式，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适当分离。原因就在于宏观、微观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目标与执行上不完全一致，审慎监管管稳定，行为监管管公平，混在一起影响监管政策的执行效果。

第三，争取由监管、财政和央行三方合力构建国家金融安全网络。国家金融安全网的目标是识别风险并尽可能地化解风险。在实际运行中，安全网既要按事前、事中和事后区分监管责任，也需要各个部门积极作为。比如央行主要负责系统性稳定和大而不倒的问题，同时也要在机构出现问题时提供最终贷款人支持。财政的功能主要是代表政府在出现大问题时拿出资金兜底。一些西方国家发生大危机时，国家财政有时会主动注资，央行也主动提供流动性。因为只要稳住系统，最后不但可以全身而退，还有可能挣钱，即便不挣钱，花钱维持金融系统稳定，本来也应该是国家财政的重要职责。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就是短期权宜之计长期化的问题。这些年，一遇到金融风险问题，上头就会要求把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压实到地方政府。这一举措作为短期权宜之计没有问题，但长期来看，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资源、资金、动力持续地完成这样的工作，要打个问号。倘若地方政府不具备这些能力和资源，将来就可能引发其他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同样需要系统性的思考。

走老路稳增长，可能稳不住¹⁰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疫情过后，大家要重新开始过日子。为此，我们的研究就要对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形成正确的认知，不能再把现在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简单归咎于疫情，否则，有些错误还会重复。

在我看来，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转轨和疫情叠加的结果。

当前经济问题的根源不是疫情

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以平台为工具，通过土地抵押来形成资本，再利用金融做杠杆，住房为出口，城市化发展为目标。这种发展模式有两个结果，一方面给地方政府带来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攀升，房价过快上涨，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和居民住房负担加重。另一方面，自2008年以来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来拉动增长的效率逐步递减，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速的贡献逐步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发生变化，具体的表现就是经济持续下行，我们判定这是经济新常态，需要转换发展动能，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种基本判断的指导下，中国开始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此次转轨直指2008年以后经济发展模式的几大命门：

1. 地方政府债务。现在已经明确规定允许地

方政府举债，但地方政府的责任也随之加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前门”。

2. “堵后门”，最主要举措是规范土地储备，叫停土地抵押。这意味着2008年之后经济发展模式中最重要的增长工具——土地抵押，基本全面叫停。

3. 针对2008年以后经济发展模式中最重要的支柱房地产，中央立下“房住不炒”的大政方针，具体实施方面则试图通过稳房价、稳地价和稳预期，形成新的住房模式。然而这些政策的落实收紧了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限制和对房地产贷款的限制。

4. 为了确保“房住不炒”落实到位，土地政策开始变得更加集中，也就是被大家称为“双集中”政策，以此来稳地价、稳房价和稳预期。

综合来看，以上政策直指2008年以后发展模式中的债务土地抵押、住房功能和土地供应等“命门”，通过四大工具分头实施且带有休克性质。这些政策不是联动出台，而是由各部门分别出台。

上述政策做法带来了几种结果：

1. 地方政府本来可以发债，上述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发债方式，但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量没有降低，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信用风险事件频出。

10. 本文根据刘守英教授2022年12月18日在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国新征程”环节的演讲整理。



2. 叫停土地抵押使中国发展模式好像回到2008年之前，即回归土地财政模式。一方面，政府叫停土地抵押，地方政府无法通过平台公司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用地和占比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维持土地财政，将大部分土地重新用于供给工业用地，靠土地引资。此外，地方政府由于失去土地抵押收入，只能重新走上更大规模的住宅和商住用地卖地之路，以此获取更大体量的土地出让收入。因此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里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节节攀升，然而土地开发和征地成本也在同步大幅上涨。尽管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增加但土地净收益却大减，财政风险随之增大。

3. “房住不炒”让房地产去库存趋势非常明显，但住房供应、销售等环节正与整个房地产市场一起陷入萎缩，施工、竣工和销售均不断下降。此时的房地产业已经陷入比较糟糕的境地，但政策仍在进一步收紧加码，直到专门针对房地产业的“三条红线”，导致整个房地产业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大幅下滑。

4. 住宅用地的本意是试图通过稳住土地价格来稳住房价。在整个住宅用地采取“双集中”供应后，我们并没有等到一个稳定的土地市场，反而是萎缩的土地市场。第一轮“双集中”过程中，土地市场异常火爆，因为地方政府担心越往后越拿不到地，受此影响，很多企业在这一轮集中供应过程中，囤积土地。到第二轮集中供应时，土地供应成交热度显著下降，成交面积大大减少。在整个土地市场趋冷的背景下，土地溢价率持续下降，流拍量直线上升。此后的第三轮集中供应，政府试图放宽规则来刺激企业拿地，但由于资金监管非常严格，整个市场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反应，土地市场进一步走弱。

这一系列的政策带来何种结果？如今的地方政府已经无法再通过土地抵押来获得资金，回归土地财政模式以后，因为房地产市场出问题，地方政府正面临更大的财政困难，其土地出让金的下行压力仍在进一步增加。

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局是模式转轨，而不仅仅是疫情防控。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四项政策为支撑的“以地融资”发展模式。为了终结上述模式，我们决定换轨，然而在模式换轨过程中又叠加疫情，现在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收缩。

目前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稳增长，如果只能采取原来的政策，稳增长很有可能稳不住。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模式换轨叠加疫情负面影响，由此导致整个经济收缩。这其中，一是经济增长收缩，出现负增长；二是需求端消费的收缩。

疫后经济如何重启？

我认为2022年和2023年的经济工作，首先还是要继续修复经济，排名第一的修复对象就是房地产。从2022年开始，房地产政策已经从严控、松绑，发展到救市。排名第二的是放松地方债，有关政策已经展开，政府希望以此起到稳增长和稳投资的作用。此外，专项债的使用范围也开始扩大，政府已经采取多种方式来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排名第三的是集中供地的政策开始放松，政府希望以此重振市场信心。

目前看来，上述修复政策作用十分有限。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债务继续增大，压力也不断增加；之二是房地产市场对政策放松的反应不及预期，商品房销售市场尽管趋向平稳，但总体仍在下降。个人按揭贷款同比增速仍在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环比跌幅再度扩大。房屋新开工面积下跌有所放缓，但房地产企业的到位资金仍面临很大的问题，房地产企业融资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土地市场热度在持续下降，土地购置和开发能力减弱，土地市场持续下跌，商品房待售面积在增加，房价持续下跌。房地产企业拿地热情并不高，现在主要是国企和头部企业在拿地。目前集中供地的政策仍在持续放宽，但基本见底。

在上述背景下，我认为疫后经济的重启，仅做一些修复远远不够，还需要做到如下四点：

1. 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与疫情有关，也和国内这几年一系列政策导致整个经济循环中断有关系。我认为，要畅通循环，必须从包括生产、消费和收入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环节入手。此外还需要畅通治理环节。这些年为实现疫情管控，经济领域已经出现大量的体制回归，这些回归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不畅。

2. 恢复市场活力。如果市场活力不恢复，怎么救市可能都不管用。如果市场主体的信心不恢复，整个国民经济的修复就缺少动力。同时还要注意兼顾疫情引发的国家秩序和安全问题，包括失业率、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和农民工等问题。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问题。我们要吸取疫情期间转轨的教训，应

该把转变“以地谋发展”的模式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认真总结模式转轨的经验，重新回到转型的道路上去。这其中包括转变土地功能，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防范系列性金融风险等诸多工作。

3. 针对现有的土地抵押融资制度，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将其终结。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融资的功能仍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功能，这也是中国非常独特的一项功能。在我看来，土地融资要向制度化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中断。

4. 通过土地市场化的改革来支撑整个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促进都市的发展和城乡融合。

在上述举措基础上，我们才能建构新的发展模式，落实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制造业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体制开放，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和制度性的对外开放。



对话：中国经济新征程上的重要挑战与应对¹¹

姚洋

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北大南南学院执行院长

夏斌

国务院参事室原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王敏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脱钩？

王敏：首先请问姚洋老师。中国过去 40 年实现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比较自由的全球贸易让中国获得了先进技术，学习了发展经验。目前外部环境有一些变化，包括中美竞争等。12 月 15 日美国又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管制。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脱钩？

姚洋：的确，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芯片领域，对中国可谓步步紧逼。中国到目前的应对策略基本上是理性的。其实中国也有针对美国的杀手锏，但一直在保持克制。美国一些失去理智的做法，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这对推进全世界技术水平的提高极其不利，不仅对中

国不利，对美国也一样。

面对美国的高压，我们首先要准确评估中国经济所受的实际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在芯片等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进步速度的确受到影响，但目前这些领域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很小。所以我认为不要夸大美国对中国技术控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对此做过调研，报告基本已完成。调研发现，美国实体清单上被制裁的中国企业有三分之一受影响很大，三分之一受影响有限，还有三分之一通过某些手段规避了美国的技术控制。

因此，没必要夸大美国技术管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否则我们对整体经济发展的信心和政策用力点都会出现偏差。总体而言，全球化的方式有所改变，但方向没变。

11. 本文根据五位嘉宾 2022 年 12 月 18 日在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国新征程”环节的圆桌对话整理。

扩大内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王敏：请问夏斌老师，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中央政府扩大内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政策又该如何落地？

夏斌：在党的二十大会议前，我在8月份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必须重点关注三大问题》。我结合这篇文章来讲一下。

扩大内需的一个关键内容是扩大消费。消费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我国的低收入群体占人口中的大多数，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多达8.7亿。扩大消费从根本上是如何让这部分人提高收入，而不是扩展消费形态等。低收入群体又主要以农民为主，因此要考虑如何平衡土地制度改革和宅基地改革，如何能更多地让利于农民，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此外，包括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中低收入群体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解决民生保障问题是扩大消费的关键。

目前，由于我国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民生保障水平不一样，建议尽快取消特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之外的其它城市的户籍制度，让居民能够在城市之间自由迁徙。这也是我在之前那篇文章中重点提出的。能够自由迁移，意味着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制度可以在不同城市之间统一标准，农村人也可以享受城里人的生活水平。只有民生问题得到保障，老百姓才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消费。

针对民生问题建立起全社会统一的基本保障，可以分步走。先针对特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之外的其它城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现在主要在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医疗部门分别进行改革，但改了这么多年成效不大。此外，消费升级、消费形态创新也要同步完成，但这与户籍改革不矛盾。

扩大内需的另一个内容是扩大投资。目前，民营企业投资占我国投资总额的50%甚至更高。当下民企投资的主要问题是信心不足。为什么投

资信心不足？党中央、国务院反复讲“两个毫不动摇”和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产生了“五六七八九”的贡献，包括国家领导人也亲自召开专家座谈会，但投资信心不足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所以我在文章中建议，能否由中央出面，花一年多的时间，组织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级政府、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认真对照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思想，对已制定的各项业务规定、政策进行一次彻底的巡视，通过自查摆问题，列出纠偏项目（制度和政策），纠正“冤假错案”，并予以公布。有一纠一，有二纠二，及时纠正。最后由中央国务院组织检查，进行总结，做到不同的企业主体能够真正开展公开、公正的竞争。

只有我们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让民营企业重拾信心，把钱拿出来搞投资，这样才会对扩大就业、增加GDP、稳定社会有好处。当然投资领域中还有很多细节问题，但目前最主要的还是投资信心不足。

此外，还有投资风险问题。首先，原来没看到风险，是因为高增长红利抵消了一些风险和损失，有国家兜底。现在要把政策性投资和商业性投资分开。其次，对监管政策要冷静思考与总结。具体到投资领域，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该出清的要出清，否则老拖着解决不了问题也会影响政府信用评价。投资者都是用脚投票，他不买债，你就发不出债，融不到新资金，最后影响经济发展。

总之，我们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并且解决当前关键性的问题才能让内需重振。

地方政府债务会不会构成潜在的金融系统风险？

王敏：请问黄老师。过去二三十年，地方政府以地融资积累了不少债务问题。而过去三年，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限薪。地方政府债务会不会构成潜在的金融系统风险？从中央的角度有没有好的办



法化解？

黄益平：这其实是一个财政问题。我简单说三点。

第一，地方财政压力确实在加剧。当前压力确实是前后一系列事件共同导致的。举个例子，全球危机以后，地方财政改革就是“关后门，开前门”，过去的很多融资渠道慢慢中断，包括卖地，所以地方政府收入减少，这是事实。

第二，地方开支压力增大。疫情期间，各地财政仅在核酸这一项上平添巨大的压力。2021年年初中央提出“稳增长”，但力度跟以前完全没法比。2008年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最后实际投资30万亿。当时中央出钱并不多，但拉动了各个渠道投资。现在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收入受到约束，另一方面是疫情防控开支巨大。此外，地方政府还承担着维持房地产行业金融稳定的责任。所有问题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开支。这才是短期现象，长期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这也是我们在财政改革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地方政府的任务很多，经常是中央发一个文件，地方就要承担责任，但其实很多资源又没有跟着下来。比如防疫问题、绿色环保治理问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地方政府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缺乏相应的财政配套，尤其是面对那些临时性要求。我认为，需要对全国财政格局做一个总体思考。上世纪90年代进行分税制改革后，多年前又做了一次调整，但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第三，会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单纯就地方财政而言，我感觉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有很多地方平台，如地方国债、国资和一些违规项目等的确存在风险。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一些地方已经很突出，甚至已经爆发，有的地方还在拖着，但能拖多久不知道。因为我国地方政府不能独立破产，所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不能完全脱离关系，最终还要算总账。现在公共债务的杠杆率还没有高到不可承受的阶段，所以当下

的关键问题不是减少债务，而是把分母做大，因为分子在短期内很难调整。把分母做大，就是要在经济困难时候把经济搞上去，而不是先去控制财政和金融机构债务。如果经济起不来，所有这些风险只会越来越大。

因此，当前我们要防范风险，但是否会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发生系统性公共债务危机，目前看来可能性不是很大。

人口结构和规模变化如何影响房地产市场？

王敏：请问刘守英老师，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化发展。大量人口推动房价包括土地市场火爆，同时也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的以地融资。我想请问刘老师，人口规模下降且新生人口持续下降，这对今后房地产市场甚至土地市场需求会不会形成一个制约，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是否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刘守英：关于房地产和土地市场，我讲三点。

第一，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以前地方政府有困难或者想过得好一点，就可以通过卖地挣钱，那时房子只要买了就一定能涨，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失去人口红利是部分原因，但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转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首先是目前已经没有那么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高地价和高房价继续上涨，同时经济增速下行是规律性下行。其次，支撑地方政府园区发展的产业已经开始转型。沿海地区很多企业生产的东西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卖不出去，于是开始寻求主动转型。最后，地方政府卖地成本上升。大量土地都是存量土地，存量土地的拆迁成本和土地开发成本都很高。因此，除了人口因素以外，整个发展模式开始主动转，靠卖地、房地产支撑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第二，住房的功能当然是为了住，但也有投资功能。因此，房子兼具居住功能和资产属性。

就整个住房供应来看，政府要完善公共住房供应制度，同时也要加大对改善性住房、高品质住房和新需求住房的供应，应该通过两轨并行来保障整个住房市场的良性发展。要保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相应的政策根本是加大市场化程度，加大土地市场供应。关于土地市场供应，现在有大量存量地可以补进市场。政府不要把这些地都拿在手上，并指望以此来稳地价、稳房价，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还是要通过市场化方式来解决。此外，城中村土地和占比过高的公共用地，如市政设施都要投放到市场上来，不要再由政府拿在手上。整个住房市场的良性发展要靠更加市场化供应土地，这是实现“住房是用来住的”功能的前提。因此，可以让两轨的房地产市场并行，以解决当下的突出问题。

第三，把握城乡关系重构趋势推动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包括三方面，一是城市更新，二是都市圈发展，三是城乡融合。这是未来城市化的三种形态，对整个住房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影响也非常大。城市更新可以显著提升住房和土地价值，政府获得土地收益，居民改善住房质量。都市圈发展有利于打通都市圈内从村庄到城市的整个体系，不再限于城市内部的发展。都市圈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整个土地规划应该从过去的行政规划转向以都市圈为尺度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市场化，这实际上也会释放大量的土地和住房需求。城乡融合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形态，城乡之间的区域对未来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展有重要作用。

总之，没有过不去的槛，核心是要加大市场化程度，加大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来提升市场信心。

提振信心、改善预期等措施在落实中容易遇到什么问题？

王敏：有听众想问姚老师。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提振信心，改善预期，尤其是

在消费端发力，您觉得后续落实政策时最大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

姚洋：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认为主要风险在于政府能不能找到一个促消费的抓手。政府对促生产可谓驾轻就熟、抓手很多，但在促消费方面经验不足，因为我们以前很少促消费。

这次把消费提到一个高度，但怎么去促消费？其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主要就是给老百姓发钱。直觉告诉我们，当消费不足时，只能提振老百姓自主消费的那一部分潜力，即跟老百姓收入有关的那一部分消费。如果等着老百姓收入上去之后再促消费，就晚了，经济可能已经进入死循环。从经济学的角度，投资要往循环里面主动注钱，消费也一样。从政府的角度而言，今后发消费券时步子能不能迈得更大一些？如果一个省的经济规模在5万亿以上，发3亿消费券则意义不大，至少得发到1%即500亿才对促消费明显有用。就全国而言，发消费券要发到1万亿以上，才会对整个经济循环真正起效果。

为什么科技和民生的重要性明显提高？

王敏：请问夏斌老师。2022年在发展经济中不仅强调了经济政策中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还特别提出来科技政策和民生政策。为什么科技政策和民生政策对经济发展也变得特别重要了？

夏斌：这次强调了民生政策、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从科技创新角度来说，传统的增长模式不能再延续下去，要维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就必须靠科技创新。从国内GDP核算角度讲，出口要上去，而生产包包、鞋子的时代已经过去，要增加出口竞争就要靠科技创新。从消费角度来讲，传统的消费模式、消费形态在转变，不搞科技创新，有些企业也活不下去。所以，不管是国家竞争还是企业经营，都需要科技创新。一个文明社会的进步也要靠科技创新。



从民生角度，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养老都属于基本民生。消费对 GDP 的贡献已经达到 70% 左右，这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格局，要把经济维持下去，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必须抓好民生保障。我们讲中国发展的余地很大、空间很大、韧劲很大，大在哪里？大就大在还有巨大的消费值得推动。通过消费推动去提高投资，通过科技进步去扩大消费，这才是健康的循环。

2023 年最大的金融风险是什么？

王敏：请问黄益平老师。虽然金融危机总是以令人想不到的时间和方式发生，但您认为 2023 年能想到的最大金融风险是什么？同时，怎么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又推进资本市场开放？

黄益平：我也希望知道 2023 年到底会在哪儿出现风险，但确实很难判断。如果让我做一个预测，我认为 2023 年的情况是宏观反弹，微观困难。经过三年抗疫，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一般老百姓家庭，资产负债都已经非常紧张。经济反弹以后，经济活动能不能很快恢复，还会面临一些约束，所以我认为报复性反弹在个别领域也许有，但全面出现还是比较难。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有一些领域的风险确实值得关注。

一个是地方平台。我们一直在讨论他们现在很困难，但如果 2023 年财政没有改善，收入没有特别增加，困难还会持续。

另一个是中小银行。疫情期间，中小银行为响应政府号召给很多中小企业发放了贷款，于是中小企业贷款在 2020 年增长 30%，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又增长 25% 左右，但基本都是政策推动的增长。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有不少最后还是倒闭，2023 年中小银行整体的不良率也还会增加。虽然我并不认为所有中小银行都会有问题，但是个别风险集中、管理又不太理想的银行问题比较大。

大。

怎么样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支持金融市场的开放？我觉得二者是辩证关系，一方面，如果没有准备好，就不要开放；另一方面，开放本身可以强化市场纪律，这也是改进风险管理的重要步骤。

2022 年美联储使劲加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受到影响甚至发生金融危机，因为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国际货币，而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资产负债表上有资产错配的问题。此外，2 月份时美国制裁俄罗斯，我一直认为这是件非常奇特的事情，相当于用一帮主权国家使用的美元去制裁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这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信誉是一个重大打击。这意味着，我们要想办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金融市场开放是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开放是大方向，但是怎么开放，具体做法上确实要稳健。很多国家开放后爆发了金融危机，因此要在开放和稳定之间求平衡。

具体怎么做？

第一，选择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没准备好就不要开放，准备好了再开放。对此，我们其实一直准备有一套策略和方向。

第二，要讲究改革秩序，不要顺序颠倒。如果当国内的金融市场还没有理顺就放开了，那就是自寻烦恼，肯定会加大经济波动，所以改革政策出台的次序非常重要。

第三，开放后仍然可以采取一些宏观审慎政策，有一些举措可以防范风险积累，这也是这两年央行在做的双支柱政策。

因此，要一方面开放，另一方面保证总体金融稳定。

如何让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循环更通畅？

王敏：请问刘老师，“疫后经济”要畅通两大循环，国内体制如何从管控向市场回归，让要

素流动起来？中国经济怎么快速向国际回归，打通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循环？

刘守英：“疫后经济”是指原来疫情全面主导一切，现在要转向开放以后的经济恢复。目前我们已经开始转向疫后模式。疫后模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循环问题。

为了应对疫情，我们建立起“战疫体制”。现在要回到国民经济循环，首先得从战疫体制回到常规体制，其核心就是要从行政治理转向市场治理。

其次，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包括生产、消费、流通和收入环节，而疫后恢复循环的核心是在收入方面。收入如果上不去，循环就回不来。同时也不能先抓生产、消费、流通，最后再抓收入，这样倒着抓，循环也回不来。只有先让就业起来，国民收入才能起来，而收入起来以后才能支撑消费。所以，如果只是试图通过投资来畅通循环，那就要出问题，现在很多救市措施还是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不可取。恢复整个循环，应该按照先恢复主体、恢复就业、恢复收入这样的逻辑。

再次，关于中国经济回归国际的问题，我不是很担心，因为至少从经济上来讲，世界还没有到放弃中国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面向国际循环时要有定力，要对不同方面做分析。改革开放40年多来，我们的产品要往高端走就离不开发达的技术和发达产业做支撑。而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产业特性来看，中国都可以考虑加大与欧洲的经济循环，因为我们和欧洲有互补性，欧洲对我们也有需求，这样也会促进我们产品和产业的提升空间。

就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我们不可能所有中低端产业都往越南、老挝转，他们的产业链条布局还支撑不了。我在顺德和南海调研时发现，产业链条对当地的产业环境需求非常高。所以我们现在一些中低端产业在往外转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腾笼换鸟”之后自己一片空白，造成产业空心化，要吸取美国的教训，分析哪些产业可以继续留在国内，哪些可以往外走，为此政府和企业都要做一些事。

最后，“一带一路”等国际循环的核心问题是要防范风险。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报告发布

2023年2月25日,《粤港澳大湾区数字金融的发展机遇、挑战与前景》报告在“明珠湾金融峰会(2023)”上正式发布。该报告由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支持,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汇丰商学院联合课题组完成。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助理沈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主管谢绚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共同负责该课题,课题组成员还包括王诗卉、胡诗云、崔荣钰、吕子苑。

北大国发院夺得“第十三届全国名校EMBA网球精英赛总决赛”冠军

2023年2月25日,北大国发院网球俱乐部在“第十三届全国名校EMBA网球精英赛年度总决赛”上夺冠。作为全国顶级商学院的网球盛事,本届总决赛四支参赛队伍经过南北赛区激烈角逐后汇聚杭州。北大国发院作为北方赛区冠军队,决赛场上对阵南方赛区亚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另有北方赛区亚军北大光华对阵南方赛区冠军长江商学院,之后由两场比赛的胜出者展开冠军争夺。国发院网球俱乐部参赛队员沉着应战,最终以总分22:18夺冠。

《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21年)》结果发布

2023年2月11日,《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21年)》结果发

布。本轮调查由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合作开展,涵盖全国26省、482个样本县,共采集到17533份65岁以上老年人的有效样本数据,其中包括3665位百岁老人、6000多位超90岁老人。这也是迄今全球最大规模高龄老人追踪调查研究,已进行9轮全国性追踪调查,为开展老年健康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姚洋教授出席座谈会并发言

2023年2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和基层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长王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中国外运公司董事长冯波鸣等9位代表发言。

林毅夫、黄益平等教授著作获评“2022十大金融图书”

2023年2月1日,“2022十大金融图书”名单揭晓,林毅夫教授所著《中国经济的前景》、黄益平教授与王勋研究员合著《读懂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上榜。获奖名单经过网络投票及专家评审产生,评选活动历时近两个月,由新浪财经联合中国银行《保险报》、中国金融出版社和中信出版集团等发起。

版 权

主 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主 办: 北大国发院智库 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主 编: 黄卓
执行主编: 王贤青
执行副主编: 白尧
编 辑 部 (按姓氏拼音)
曹毅、高玲娜、刘海波、王勋、王志勤、朱丽

电子订阅方式

扫描本二维码，填写联系信息



合作联系方式

电话: 010-6275 9033
邮箱: ybai@nsd.pku.edu.cn

官方网站

www.nsd.pku.edu.cn

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大国发院



北大国发院智库